

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中的 印度因素及其前景^[1]

宋海洋

【内容提要】自2017年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被再次提出和推动以来，印度在其中的角色备受瞩目。一方面，印度强调“中国威胁”，希望联合美日澳三国平衡中国力量；另一方面，印度对组建新的“四国安全对话”机制采取区别于其他三国谨慎对待的立场。印度之所以持谨慎立场，主要是担心完全投向该联盟会损害印度自身的安全、经济和战略利益。总体而言，印度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牵制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印太战略环境。未来，印度的立场也将对该机制的推进产生诸多影响。中国应该对“四国安全对话”中的印度因素有清醒认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以消除或减少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四国安全对话 印太战略 战略自主 中印关系

【作者简介】宋海洋，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22)02-0117-19

[1] 本文为广东省社科基金课题“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政策研究”（GD19CHQ01）的阶段性成果。

2021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和美日澳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首次举办“四国安全对话”峰会(Quad Summit),这是四国领导人在当年3月份举行视频会谈后首次线下会谈,标志着“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以下简称QUAD)有了重大进展。会议从外长级升级上升到首脑级,议题从传统安全到疫苗外交、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领域,印度学者将其称为QUAD的3.0版。^[1]值得注意的是,从2007年QUAD的正式建立到2017年再次重启,再到2021年的实质性推进,印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加入QUAD并发挥积极推动作用,是印度在当今国际战略格局和形势发展之下加强自身安全的战略选择,但同时它也对在该机制内与美日澳的安全合作保持一定的谨慎立场,显示出印度的国家战略自主性。“四国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前景、印度的角色地位及其演变、印度加入QUAD对印太地区安全格局及中印关系的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QUAD的起源和印度的角色

QUAD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当时为了应对灾后救援的巨大挑战,美国倡导并促进了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海军的协调行动,以加强在人道主义领域的非正式战略对话,四国形成了所谓的“海啸核心小组”(Tsunami Core Group)^[2],这是QUAD的最早雏形。期间,印度表现积极,派出了约32艘船和5000名士兵参与该次国际救灾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印度向受灾的斯里兰卡和印尼提供了人道主义救援。2007年5月,在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支持下,四国在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议期间,提出了旨在深化彼此战略关系以及在亚太地区推进民主国家安全合作的“四方倡议”,从而正式形成“四国安全对话”机制。9月,四国和新

[1] Vice Admiral Anil Chopra, “At the Cross-Roads: A ‘Fleet-in-Being’ for QUAD 3.0?” *VIF*, September 22, 2021, <https://www.vifindia.org/article/2021/september/22/at-the-cross-roads-a-fleet-in-being-for-quad-3.0>.

[2] See Seng Tan, “Consigned to hedge:south-east Asia and America'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1, 2020, p.133.

加坡在孟加拉湾进行了海上联合军演，这意味着四国合作的领域扩展到军事层面，不再单纯是应对海洋突发事件的磋商性地区论坛。此后，由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决定退出四国对话机制等因素，QUAD 已名存实亡。

随着全球政治及经济重心逐渐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转移，印太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崛起及其自信举动正在改变着全球的地缘政治，新的力量平衡正在出现，而“印太”概念的核心特征就是 QUAD 的死灰复燃。“印太”概念最早源于 2007 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演讲时提出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所构成的“两洋交汇”，安倍提出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民主安全菱形”（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构想。2016 年，安倍政府正式出台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其基本目标包括三个方面：（1）确保美国对该地区的持续承诺以保证日本的安全与经济繁荣；（2）通过制定新规则、加强现有国际规则和规范来约束中国；（3）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的合作关系，并在必要时增强其能力。^[1] 简言之，即联合美印澳制衡中国。2017 年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正式采纳安倍的提法，从 2017 年 12 月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到 2019 年 6 月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其“印太战略”框架日趋明晰，即希望借助传统盟友日、澳和新兴力量印度制衡中国，最终实现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拜登执政后继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继续强化美印关系。鉴于战略地理位置和发展前景，印度受到其他三国的高度重视，被美国称为印太的“战略支点”（strategic fulcrum），被澳大利亚视为“重要战略伙伴”（significant strategic partner），被日本视为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关键战略伙伴（key strategic partner）。^[2] 在美日澳的积极拉拢和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力推动下，2017 年 11 月，四国官员在越南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议，就“印太地区的共同

[1] Kei Koga, “Japan’s ‘Indo-Pacific’ question: countering China or shaping a new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1, 2020, p.69.

[2] Jagannath P. Panda, “India’s Call on China in the Quad: A Strategic Arch between Liberal and Alternative Structures,”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 3, Issue 2, 2018, p.90.

利益议题”展开讨论，这标志着 QUAD 的重启，可称为它的 2.0 版。2019 年 9 月，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议，这标志着四国安全对话已升格为部长级。2021 年 3 月，四国又将会议升级到峰会级别。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提出喜出望外，认为这是印度外交的重大机遇。外交官尼鲁帕玛·拉奥琪指出：“以前的亚太概念寻求将印度排除在外，比较而言今天的印太术语将次大陆作为东方世界完整的一部分纳入其中。”^[1]由此可见，印度认为美日倡导的“印太战略”承认印度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日益突出的地位，这将赋予印度“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更大的合理性，从而顺理成章地发展与印太区域大国的战略关系，在更广阔的地区发挥印度的作用，彰显其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印度的战略利益。从 2012 年开始，印度的战略思想家和政府官员也开始采用印太概念来描绘地区和世界形势发生的变化。2018 年 6 月，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正式阐述了印度的“印太观”，强调拥抱印太概念，包括随之而来的战略机遇和责任。2019 年 4 月，印度外交部成立“印太司”（Indo-Pacific division），该部门“将印度洋地区协会、东盟地区和美日印澳四方”纳入进来，这意味着印度在印太概念框架下确立起新的外交思路。印度著名战略学者拉贾·莫汉和布拉马·切拉尼甚至呼吁印度政府借此改变传统的地缘政治立场，将“印太”视作单一的地缘政治舞台，放弃传统的不结盟政策以便与同样忧虑中国崛起的国家结盟。

二、印度加入 QUAD 的背景和战略目标

印度之所以加入和推动 QUAD 发展，主要着眼于应对国际战略格局变迁和制衡中国日趋增长的影响力，以维持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

[1] Priya Chacko, “India and the Indo-Pacific from Singh to Modi,” in *New Regional Geopolitics in the Indo-Pacific: Drivers, dynamics and consequences*, ed. Priya Chacko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49.

（一）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印度的战略忧虑，认为中国在双边、地区、国际层面都成为印度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阻力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影响力增强，中印综合国力的差距不断拉大，印度的战略忧虑不断增加。1960 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365.3 亿美元，占中国 597.1 亿美元的 61%；1998 年印度的 GDP 为 4157.3 亿美元，占中国 1.02 万亿美元的 40%。^[1]而根据最新数据，2021 年印度的 GDP 约为 3 万亿美元，仅为中国 17 万亿美元的 17%。中印国力差距不断拉大对一直有世界大国情结的印度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其官方和学界均认为中国崛起在双边、地区（南亚与印度洋）及全球层面上都对印度构成威胁。

在双边层面上，中印边界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而且有升级为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近年来，中印军队之间多次发生冲突：2017 年 6 月发生了长达 72 天的“洞朗对峙”；2020 年 6 月爆发了“加勒万河谷冲突”。印度认为中国正是依靠强大的国力在两国边界对峙中占据优势。印度金奈中国研究所学者阿比舍克·达斯写道：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印度就将包括“中印是兄弟”“武汉精神”“金奈联系”（Chennai Connect）在内的观念清除掉了，现在是推行现实政治的时候。^[2]

南亚地区层面，中国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日渐扩大的影响力已成为印度严重的战略关切，印度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南亚各国的投资削弱了印度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南亚次大陆，印度长期推行印度版“门罗主义”政策，视南亚为其后院和势力范围。而目前南亚 8 国中，除了印度和不丹之外都支持中国的倡议；中国几乎同所有南亚国家都有密切的经济关系，2015 年中国与南盟（SAARC）国家（印度除外）的贸易总额为 425.9 亿

[1] Rajesh Basrur, “The BRI and India's Grand Strategy,” *Strategic Analysis*, Vol.43, No.3, 2019, p.189.

[2] Abhishek Das, “India's China Predicament: Unsolvble Riddle or Solutions in Historical Analogy,”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October 1, 2020, <https://www.c3sindia.org/geopolitics-strategy/indias-china-predicament-unsolvble-riddle-or-solutions-in-historical-analogy-by-abhishek-das/>.

美元,几乎是同年印度与邻国贸易总额 233.9 亿美元的 2 倍。^[1]此外,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对华友好政策使印度倍感忧虑。印度尤其对中巴友好关系耿耿于怀,臆测中国在利用巴基斯坦制衡印度。按照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莫汉·马利克的说法,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巴基斯坦不可能对印度构成威胁。^[2]印度认为“中巴经济走廊”(CPEC)穿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领土主权,有针对印度的地缘政治企图。印度将印度洋地区视作“印度之洋”(India's Ocean)或“印度湖”(Indian Lake),极力排斥其他大国的存在,因此臆想中国在斯里兰卡、缅甸、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等国建设的港口是所谓“珍珠链战略”(String of Pearls),意在包围印度并削弱其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3]印度担忧中国租购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 99 年、开发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以及中国在吉布提和瓜达尔港的战略存在都会进一步使印度的安全环境复杂化,严重影响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动态。

在国际层面,印度认为中国阻碍其崛起进程,因为中国阻碍印度联合国“入常”、成为核供应国集团(NSG)成员的尝试。^[4]由于中印间存在的多重矛盾,促使印度推行大国制衡政策,寻求借助外力来制衡中国影响力的增长,这些都是印度积极参与 QUAD 的动因。

(二) 印度希望通过加入 QUAD 达到“遏制中国”的多重战略目标

印度学者直言不讳地将印度参与 QUAD 的首要动机描述为“遏制中

[1] Roy-Chaudhury, "India's perspective towards China in their shared South Asia neighbourhood: Cooperation versus competiti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24, No.1, 2018, pp.102-106.

[2] Mohan Malik, "India and China: Bound to Collide?" in *Security Beyond Survival*, ed. P.R. Kumaraswamy(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4),p.135.

[3] Dhanwati Yadav, "Complexity to compatibility: Sino-Indian bilateralism concerning maritime security," *Maritime Affairs*, Vol.15, No.2,2020,pp.113-133.

[4] Ashok Rai,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2 (Quad 2.0)-a credible strategic construct or mere foam in the ocean?" *Maritime Affairs*, Vol.14, No.2, 2018, p.144.

国”。拉贾·莫汉指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平衡中国是印度地缘政治的 DNA。^[1] 随着两国间的经济、军事差距急剧扩大，印度已越来越接受外部平衡的想法。2002 年，印度著名战略学者、曼尼帕尔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纳拉帕特提出了“亚洲版北约”构想，主张印度和美国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并吸纳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参加。莫迪政府执政后，更加强调借助外力制衡中国，组建 QUAD 是印度寄以厚望的对外战略路径。印度前外交秘书希亚姆·萨兰认为，QUAD 将成为应对中国挑战的关键工具。^[2]

印度希望借助 QUAD 的力量达到的具体目标有二：一是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越来越担心这一倡议会使印度在南亚的经济影响力被边缘化，希望通过 QUAD 为南亚国家提供新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选择。二是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规范中国的海上行为，以确保印度的主导地位。印度防务分析研究所学者贾甘纳特·潘达指出：“迫使印度将支持 QUAD 作为一项战略主张的原因是保护自身的海洋权益，它正受到中国在印度洋日趋增加的战略存在的威胁”。^[3] 印度观察家基金会（ORF）学者阿比南·雷杰甚至提出四国在军事上联合应对中国崛起的所谓“3D 战略”，即劝阻（Dissuade）、威慑（Deter）和防御（Defend）。^[4] 在印度的推动下，QUAD 在海洋领域已形成较高级别的战略协作与互动，其军事和战略合作趋向于形成一个松散的反华联盟。

[1] C. Raja Mohan, “The Evolution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Power Realignments in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Alyssa Ayres and C. Raja Moha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09), p.288.

[2] Shyam Saran, “Quad Can Be the Anchor for the Indo-Pacific Region,” *Hindustan Times*, June 29, 2018,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analysis/quad-can-be-the-anchor-for-the-indo-pacific-region/story-IC5jc7fxAUdI3BtD5ULwXN.html>.

[3] Jagannath P. Panda, “India’s Call on China in the Quad: A Strategic Arch between Liberal and Alternative Structures,”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 3, Issue 2, 2018, p.91.

[4] Abhijnan Rej, “Reclaiming the Indo-Pacific: A Political-Military Strategy for Quad 2.0,” *ORF Occasional Paper 147*, 2018, p.11,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reclaiming-the-indo-pacific-a-political-military-strategy-for-quad-2-0/?amp>.

三、印度与 QUAD 成员开展安全合作的基础

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对“中国威胁”的认知上存在共同之处。而基于这一语境，印美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双边关系的恢复和提升，以及印美日三边关系的推进等诸多因素奠定了印度与其他 QUAD 成员开展安全合作的基础。

首先，印度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和美日澳存在共通之处。印度认为四国具有互补的战略地理，涵盖了整个印太地区和关键海上交通要道；四国具有维持印太地区稳定的力量，能够平衡并防止任何地区性大国成为主导者，反对使用武力或强制性手段解决地区的政治和领土争端；四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致力于维护全球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海上秩序及印太地区当前的经济秩序等。^[1]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印度认为其是北京为大幅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采取的地缘战略举措^[2]，应设计替代性的经济机制来与之展开区域影响力的竞争；美国则认为该倡议会严重损害自身地缘政治利益，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构成巨大挑战；^[3]日本也认为该倡议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是中国推动的地缘政治工程，意在挑战和重塑地区秩序。它们都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持浓厚的警惕和抗拒。

其次，印美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印度“印太战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与美国的关系。莫迪政府注重对美外交，双方不断实现战略对接，提升合作级别，扩大合作范围。2015年1月，两国签署《美印对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强调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给印美和其他亚太国家提供了紧密协作、加强地区联系的机会。2016年

[1] Lavina Lee, “Assessing the Quad: 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 of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for Advancing Australia's Interests,” *Lowy Institute Analyses*, 2020, pp.4-5.

[2] Harsh V. Pant and Kartik Bommakanti, “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5, No.4, 2019, pp.835-858.

[3] Christopher Layne, “The US-Chinese power shift and the end of the Pax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1, 2018, pp. 89-111.

8月，印美签署了《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LEMOA)，两军相互为对方提供后勤支持、物资和服务，这是其军事合作强化的战略性步骤。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而印度则被定位为“全球性领导力量”和美国主要的防务伙伴，为发展美印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所倡导的“印太战略”首先是战略空间的延展，将以前的亚太战略空间扩大到更广阔的印度洋区域。^[1]其次是战略伙伴的增加，美国改变过去只倚重日、澳等盟国的做法，强调借助印度的力量制衡中国，将印度列为战略合作伙伴是其印太战略的主要支撑。^[2]2018年9月，印美签署《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COMCASA)，以扩大两国军事贸易，使印度可获取美国先进的技术和装备。2020年10月，印美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BECA)，据此两国可共享军事情报和相互提供后勤保障。拜登政府则延续了前任政府对印度的拉拢利用政策。

第三，印日、印澳双边关系得到恢复和提升。传统上，印度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的关系是比较冷淡的，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日、澳都从新德里召回了驻印大使。但在对抗中国的背景下，印度与日、澳的关系都得到提升。2000—2014年，印日从“全球伙伴关系”跃升至“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再到“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短期内实现了“三级跳”。2020年，印日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该协议将使印度海军能够进入日本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日本海上自卫队可以进入印度在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基地^[3]，这意味着印日双边安全关系进一步升级。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也不断提升。2009年，印澳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11月，印澳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代号为“AUSINDEX”的海军演习，迄今

[1] Baladas Ghoshal, “The Geo-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Open and Free Indo-Pacific’ Concept,” *National Security*, Vol. II, Issue III, 2019, p.335.

[2] Kai He and Mingjiang Li,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ndo-Pacific: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regional actors,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1, 2020, p.4.

[3] Harsh V. Pant & Premesha Saha, “India, China, and the Indo-Pacific: New Delhi’s Recalibration Is Underwa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3, No.4, 2020, p.195.

已举行过三次。2020年6月,印澳签署了《军事后勤互助支持协议》(MLSA),使两国能够相互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进行补给,深化双边军事协作。

四、印度对与 QUAD 开展军事合作立场谨慎

印度尽管在战略意图上想利用 QUAD 制衡中国,但莫迪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有一定限度,并未完全随美日澳起舞,尤其是在军事合作方面,印度拒绝参加美国主导的在印太地区开展的一些行动,而是采取了对自身有利的实用主义政策。在外交层面,印度更为强调发展与美日澳的双边战略伙伴关系,选择在双边背景下为 QUAD 提供有力支持,而对其框架下的多边外交活动参与甚少,并拒绝在多边论坛上作出可能激怒中国的承诺。

(一) 在军事合作领域希望四国保持有限合作规模。印度曾一度保持美日印三方合作模式,在美日澳印四方的合作问题上持谨慎立场。美日期望 QUAD 成为军事同盟,但印度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仍希望其保持有限合作规模。2015年,莫迪政府将美印“马拉巴尔”(Malabar)军演从双边扩大到三边,日本成为永久参与国。随后,当澳大利亚多次表达欲参加该演习时,印度均予以拒绝:印度不想将 QUAD 变成具有反华倾向的军事集团,担心刺激中国并损害印度利益。2020年以来,随着中印关系日趋紧张,印度正式邀请澳大利亚参加11月在孟加拉湾举行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1],借此发泄对中国的不满并对华施压。但实际上印澳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澳大利亚仅派出了老旧的护卫舰“巴拉腊特”号(Ballarat)参演,据此很难说四国军事同盟已经正式形成。长期来看,印澳由于在战略上存在重大差异,双方难以在军事领域深入协调。一是两国战略重心不同,南亚和印度洋是印度的主要战略舞台,并寻求在南亚的主导地位;而澳大利亚将南太平洋作为其主

[1] Tanvi Madan, “India,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 in U.S.-Japan Alliance Conference: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Quadrilateral Dialogue and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ed. Scott W. Harold, Tanvi Madan, Natalie Sambhi (RAND Corpor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2020), p.21.

要战略舞台，寻求区域优势。二是印澳所面对的“中国挑战”截然不同，印度忧虑的是中印边境争端、中巴协定及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而澳大利亚更担心中国干涉其国内政治。^[1]因此，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印度希望将四国的军事合作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上。

（二）在南海问题上避免挑衅中国并对美国保持警惕。尽管印度的各种声明和战略文件中充斥着美国反复强调的在南海地区拥有“航行和飞越自由”的字眼，主张根据国际法在南海进行畅通无阻的海上贸易，但印度至今未派遣海军在南海进行所谓“航行自由”（FONOPS）行动。2016年，时任印度防长帕里卡尔明确拒绝与美国联合巡航南海的要求。印度很清楚，如果响应美国的要求，将被视为向中国发出的严重挑衅信号；作为反制，中国同样可以援引“航行自由”到印度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海域巡航。此外，美国也会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到印度海域进行活动，最终损害印度的海洋权益。2021年4月，美国第七舰队的“约翰·保罗·琼斯”号军舰在印度拉克沙威群岛以西约130海里处的印度专属经济区执行了“航行自由”行动，引发印方强烈不满。

（三）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凸显其战略自主性。在最近爆发的俄乌冲突中，印度采取了更为明显的“中立”立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希望利用QUAD约束俄罗斯，但在3月3日举行的QUAD首脑视频峰会上，尽管美国施压，印度仍拒绝了美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参与国际制裁的要求，强调需要回到对话和外交的道路。印度外交部在随后发布的声明中仅轻描淡写地表示，“会议讨论了乌克兰的事态发展，包括其人道主义影响”；印度总理莫迪则强调QUAD的印太性质，认为“四方必须继续专注于促进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核心目标”。^[2]《印

[1] Manjeet S. Paredesi, “India–Australia strategic convergence ... with Differences,” *Lowy Institute*, January 8, 2020, <http://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india-australia-strategic-convergence-differences>.

[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Prime Minister participates in virtual summit of Quad leaders,” March 3, 2022,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4927/prime+minister+participates+in+virtual+summit+of+quad+leaders>.

度时报》指出，印度实际上已经明确拒绝将“四国安全对话”机制用于遏制俄罗斯。^[1]印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谨慎立场显示了其战略自主性。

五、印度对 QUAD 安全合作保持谨慎的动因

印度之所以在 QUAD 安全合作问题上表现出犹豫和谨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传统的不结盟政策的影响，又有各种现实利益的考量。

（一）印度坚持不结盟和“战略自主”外交原则，与美日澳的印太战略目标不符。历史上，印度对可被解释为联盟的多边安排比较反感，长期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后来逐渐演化为“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的外交原则，其中包括最大限度地保留行动自由、避免陷入同盟的纠缠。自 1947 年独立以来，不加入任何同盟机制一直是印度对外政策的标志：过去印度作为弱国，此举可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和风险；现在作为新兴大国，印度认为战略自主是其寻求安全和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因此，印度并不情愿和美日澳三国建立真正的军事同盟关系，担心会迫使印度作出更多的承诺，尤其是与中国进行严重对抗，将增加自身的战略风险和负担，因此“不结盟”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继续主导着新德里的战略思维。^[2]2017 年 11 月，印度政府在四国马尼拉会议之后发表的新闻稿中，没有像美澳的声明那样明确提及 QUAD，也未提到“航行和飞越自由”。2020 年 6 月，中印爆发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外长苏杰生仍表示，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结盟体系的一部分。^[3]

[1] Chidanand Rajghatta, “India resists US pressure to expand Quad remit while discussing developments in Ukraine,”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4, 2022, https://m.timesofindia.com/india/india-resists-us-pressure-to-expand-quad-remit-while-discussing-developments-in-ukraine/amp_articleshow/89959156.cms.

[2] Lavina Lee, “Abe'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and New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30, No.2, 2016, p.5.

[3] “India Will Never Be a Part of an Alliance System, Say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Jaishankar,” *The Hindu*, July 20, 202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has-never-been-part-of-an-alliance-and-will-never-be-jaishankar/article32142128.ece>.

从本质上讲，印度当前的外交原则是要通过分散风险并与尽可能多的主要大国建立牢固的关系来最大化其战略自主权，即印度倾向于建立多种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紧随美国和日本。印度认为只有最大程度地实施“战略自主”，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否则唯美国主导的 QUAD 马首是瞻，无疑会降低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甚至沦为美国的附庸。此外，印度的优先目标是维护其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其战略构想与 QUAD 其他成员的期望并不一致：美国担心在亚洲失去对中国的战略优势；日本担心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有关的生存安全；澳大利亚担心中国对其社会的渗透以及美国在亚洲霸权地位的下降。^[1]

（二）印度希望借助 QUAD 制衡中国，但也要避免刺激中国引火烧身。毋庸置疑，QUAD 的建立以及不断提升安全合作层次，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的，但印日澳对此讳莫如深，不愿公开承认。印度希望在利用 QUAD 制衡中国的同时，把控合作的进程和方式，尽量不刺激中国。作为两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印之间存在诸多现实利益。在经贸上，印度对华依存度较大，中国自 2008 年以来长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 年中印贸易额达 777 亿美元，虽然低于前一年的 855 亿美元，但足以使中国取代美国再次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对中国产品依赖性强，且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据统计，2018—2019 年，在印度进口的 3753 类产品中，80% 以上来自中国。^[2] 印度不得不考虑中印关系恶化对自身经济的损害。此外，印度还急需中国的投资，因此其政府无法承担疏远中国带来的后果。因此印度在寻求与其他同盟成员国合作时，也尽力安抚中国。如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曾告诉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四国集团不是“拉帮结伙”对付中国，而是“从我们民主国家的

[1] Rohan Mukherjee, “Looking West, Acting East: India's Indo-Pacific Strategy,”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9, p.46.

[2] Santosh Pai, “Deciphering India's Dependency on Chinese Imports,” *ICS Analysis*, No.120, October 2020, p.3.

经验中交流对发展的看法”。^[1]莫迪总理也多次宣称无意遏制中国，强调印度“印太”概念的包容性，暗示其不会对中国构成挑战。

（三）印度担忧美国亚太影响力下降，缺少维护盟友利益的能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01年中国GDP是美国的39%，到2008年达到62%，到2016年已经是美国的114%。^[2]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重心已经从欧美转到亚太，美国已难以完全主导亚太地区事务，并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力不从心。拉贾·莫汉指出：“当前美国相对衰落，海军资产的收缩、从21世纪头十年开始便笼罩美国的经济危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消耗，都很自然地引起人们质疑美国维持在两大洋传统角色的能力。”^[3]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约格什·乔希博士认为：“自由主义的安全秩序逐渐消失，美国正在出现所谓的‘帝国疲劳’（Imperial Fatigue）。”^[4]由于国力的相对下降，对于印度所关注的印度洋利益维护问题，美国并未起到应有的支持作用。2014年中国领导人访问马尔代夫后，中马合作不断加强，引起印度的忧虑。印度试图寻求美国的支持和干预，寄望于美国对马尔代夫施加影响，通过外交、经济和政治手段将所谓“亲中国的亚明政权”推翻。然而，令印度失望的是美日澳在马尔代夫问题上毫无作为。莫汉·马利克指出，“马尔代夫危机凸显了QUAD需要采取协调一致应对措施的必要性，但迄今为止，QUAD的调门很高，可实际成果却寥寥”。^[5]

[1] Marc Grossman, “The Tsunami Core Group: A Step Toward a Transformed Diplomacy in Asia and Beyond,”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 No.1, 2005, pp.11-14.

[2] Peter Frankopan, *The New Silk Roads: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World* (Bloomsbury Publishing, London, 2018), p.26.

[3] [印]拉贾·莫汉：《中印海洋大战略》，朱宪超、张玉梅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2014年版，第183页。

[4] Joseph Nye,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2010, pp.2-9.

[5] Mohan Malik, “China and India: Maritime Maneuvers and Geopolitical Shifts in the Indo-Pacific,”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 3, Issue 2, 2018, p.76.

（四）印度认识到美日澳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在事关印度利益的多个层面都未发挥预期作用。在 2017 年爆发的中印“洞朗对峙”期间，美日澳的反应令印度极为失望，当时美国敦促印中通过“双边对话”解决长达 72 天的僵局；澳大利亚表示必须恢复和平，不应加剧紧张局势；日本虽偏向印度，但也表示不应改变边界现状，对峙问题必须和平解决。^[1]美日澳的“袖手旁观”和“置身事外”足以表明，基于自身利益，它们都不愿意采取偏向印度而激怒中国的立场，因为中国均为其最大贸易伙伴。新冠疫情暴发后，印度意欲寻求 QUAD 帮助纾困，然而现实令印度大失所望。早在 2020 年 4 月，美国就援引《国防生产法》条款，限制抗疫医疗资源出口，导致印度疫苗生产企业无法扩大产能。在印度表达强烈不满后，美日澳才对印度进行了象征性援助。在 2021 年 3 月召开的首脑峰会上，四国决定构建“四国疫苗伙伴关系”（Quad Vaccine Partnership），通过美国开发金融公司（DFC）、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等来筹措资金在印度进行生产。^[2]印度本以为通过这种疫苗外交可以有效缓解本国的疫情困局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然而其后却再次遭受美日澳的冷遇——2021 年 4 月，美国仅给印度送去 400 个氧气瓶、18.4 万个快速检测试剂以及 8.4 万支口罩；日本和澳大利亚仅表示了援印的意愿。印度学者拉克文德·辛格指出，QUAD 对印度而言似乎是战略幻象（strategic mirage），可能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恶化问题。^[3]

（五）印度担忧 QUAD 将冲击东盟（ASEAN）的中心地位，损害双方的关系。作为重要的区域政治经济集团，东盟经过自身努力并获得大国的支持，

[1] Jagannath P. Panda, “India’s Call on China in the Quad: A Strategic Arch between Liberal and Alternative Structures,”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Vol. 3, Issue 2, 2018, p.103.

[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Quad Summit Fact Sheet, The Quad Vaccine Partnership,” March 12, 2021,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3621/Quad_Summit_Fact_Sheet.

[3] Lakhvinder Singh, “The Quad: Is it a strategic mirage for India?” *Asia Times*, October 13, 2020. <https://asiatimes.com/2020/10/the-quad-is-it-a-strategic-mirage-for-india/>.

在区域合作及国际论坛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例如东盟“10+3”、东亚峰会(EAS)和东盟地区论坛(ARF)等。2019年6月,《东盟的印太展望》文件明确指出,以东盟为中心是促进印太地区合作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东盟峰会为首的东盟主导机制作为对话与印太合作的基本平台。^[1]东南亚处于印太地区的中心,QUAD倡导的“印太战略”无疑将损害东盟目前享有的区域中心地位。作为小国集团,东盟不愿卷入美中或印中冲突之中。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发布的《东南亚国家:2020年调查报告》表明,54.2%东南亚受访者对QUAD持怀疑态度。^[2]印度为了拉拢东盟,一直宣称支持东盟在区域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东盟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中心支柱”(Central Pillar),是印度印太愿景的“核心”。随着自身崛起,印度希望在东南亚发挥更加积极的战略作用,2020年印度通过新的《印度-东盟行动计划(2021—2025)》,意在加强双边在贸易、航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因此,为了维护和东盟的关系,印度并不想完全倒向以美国为首的QUAD。

六、QUAD的发展前景与印度的角色

印太时代的来临和国际格局的变迁给印度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和机遇,作为新QUAD的支点,印度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该组织,引人瞩目。QUAD3.0版可能会扩大合作的领域、成员、形式,但形成牢固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较小,尤其印度对QUAD政策的两面性意味着该机制未来发展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1] ASEAN Outlook on Indo-Pacific, June 23, 2019, <https://asean.org/asean-outlook-indo-pacific/?highlight=ASEAN%20Outlook%20on%20Indo-Pacific>.

[2] ISEAS-Yshaf Ishak Institute of Singapor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0 Survey Report, January 16, 2020, p.33, <http://www.iseas.edu.sg/mec-events/e-launch-and-discussion-of-the-state-of-southeast-asia-2020-survey-report/>.

（一）QUAD 将合作范围扩展到基础设施领域。总体而言，印度接受印太构想更多是源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利用开放和自由的区域架构发展自身经济，因此极力推动这种合作趋向。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扩大自身地区影响力的战略举措，但自身在经济实力和基建方面均落后于中国，因此希望与美日澳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联合推出一种替代性的经济机制。印度的倡导迎合了其他三国的战略考量。“一带一路”倡议同样使美国、日本感受到了“威胁”，认为该倡议意在挑战和重塑地区秩序。在此背景下，印度努力推动四国间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协调工作，希望在金融和技术方面为区域国家提供更多“替代方案”。目前，一系列多边基础设施发展伙伴关系正在建立，印美贸易理事会和美日贸易理事会发起了“印太基础设施三边论坛”；2017年5月，印日启动“亚非增长走廊”（AAGC）；2018年4月，印日美讨论了如何在印太地区共同参与第三国基础设施开发，以便有效应对亚洲需求的问题；2020年8月，印日澳筹划启动三方“供应链弹性倡议”（Supply Chain Resilience Initiative），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二）QUAD 将增加合作伙伴。目前，QUAD 仍在发展中，有可能超越传统安全协议，成为一个多功能、复杂的安全平台，未来形成“四国+”（Quad plus）模式。这将为四国带来诸多好处：印度有机会将其领域意识扩大到马六甲海峡以外，并致力于确保其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日本可以通过与东盟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来应对东海和南海的地缘政治焦虑；美国可以通过安全和金融合作继续与中国对抗；澳大利亚可以实现与东南亚的贸易多样化并一展其海上安全雄心。^[1] 印度支持和倡导 QUAD 进一步扩员或增加对话伙伴，以增强其影响力。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政策挑战 2019—2024》建议，印度应该提出“调整版的四国安全对话”（Modified Quad），加强与东南亚国

[1] Siddharth Anil Nair, “Quad to Quad-Plus: A Cost-Benefit Assessment,” *IPCS*, February 27, 2020, http://www.ipcs.org/comm_select.php?articleNo=5651.

家的关系,以抵制中国的超霸地位和对南海争端的声索,给予台湾观察员身份。^[1]在印度的推动下,印越关系进展迅速,越南未来可能会“低调”加入“印太战略”,成为 QUAD 的潜在成员。印度鹰派学者切拉尼提出将法国和英国包括在内的“QUAD+2”的构想,因为法英在印太地区都拥有重要的海军资产,^[2]法国已成为 QUAD 的潜在战略合作伙伴。2018年3月,印法同意互相使用对方海军设施,该协议类似于印美签署的《物流交换协议备忘录》。2019年7月,印法签署《白色运输协议》,强调在印度洋分享海洋情报。2020年,印度将 P-8I 海上巡逻机部署到法国管理的留尼汪岛,与法军进行联合巡逻。印度还不断发展与英国的关系,2018年印英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将携手共建安全、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

(三) QUAD 可能仍保持其非正式性。QUAD “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的一种软制衡,因为四国正在协调应对崛起中国的安全政策”,更像是具有共同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松散国家集团,“而非建立正式的军事联盟”^[3]。未来,QUAD 可能仍将继续进行非正式的对话和协商,避免建立永久的体制结构,这源于其本身缺乏共同的战略愿景。例如2017年的四国会议充满分歧,未发表联合声明,除了维护“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目标外,四国声明的措辞也各不相同:美国强调互联互通、与国际法相一致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海上安全”;日澳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印度在倡导“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的印太”外,强调其“东向行动政策”在印太地区的中心地位。^[4]

[1] Bharat Karnad, “Time for Disruptive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ies,” CPR, June 4, 2019, p.15, <https://www.cprindia.org/policy-challenge/7849/foreign-policy-and-national-security>.

[2] Brahma Chellaney, “Japan’s Pivotal Role in the Emerging Indo-Pacific Order,” *Asia-Pacific Review*, Vol.25, No.1, 2018, p.49.

[4] Kai He and Huiyun Fe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1 2020, p.166.

[4] Vinay Kaura, “Incorporating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rilateral into India’s strategic outlook,” *Maritime Affairs*, Vol.15, No.2 2019, pp.78-102.

尽管有印度学者认为 QUAD 应该制度化, 但就目前而言, 印度政府更倾向于和其他三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s)。这和正式的同盟有本质区别: 战略伙伴关系没有明确针对的敌人, 这为与战略对手建立沟通预留了空间; 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灵活性, 且不涉及对合作伙伴的深入具体的安全承诺。^[1] 印度不需要付出重大承诺就能从美国获取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实质性好处, 实现战略收益的最大化, 同时避免陷入中美冲突的漩涡。总体而言, 印度倾向于维持“四国安全对话”机制的非正式性, 不希望将其视为“反中集团”, 这样印度可以左右逢源, 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和回旋空间。因此, 印度在寻求与美日澳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同时, 也努力在“金砖国家”框架内寻求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印度还是“亚投行”(AIIB) 和金砖“新开发银行”(NDB) 的重要成员。由于印度政策的两面性, 美国学者德里克·格罗斯曼认为印度是“四国同盟中最薄弱的环节”(Weakest Link)。^[2]

【收稿日期：2022-02-20】

【修回日期：2022-04-06】

(责任编辑：邢嫣)

[1] Rajesh Basrur, “Modi’s foreign policy fundamentals: a trajectory unchange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3, No.1, 2017, pp.15.

[2] Derek Grossman, “India is the Weakest Link in the Quad,” *Foreign Policy*, 23 July,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23/india-is-the-weakest-link-in-the-quad/>